

◀ (上接 14 版)

司却在 2001 年申请破产,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破产案。“安然”,从美式公司治理模范能源公司沦为造假的代名词,甚至导致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倒闭。

无论安然造假还是随后金融危机中的道德风险,虽然引发不少对于美国式公司治理的讨论,但是股东主权论仍旧是学界业界主流,对此岩井并不认同。这也和他认为美式股东主权论不可能成为未来公司形态国际标准的第二个根据有关。他认为,随着未来资本主义走向终极形态的后产业资本主义,金钱表面上看可以全世界流动,其实也意味着其变得不那么重要,随着金钱的统治力量减弱,金钱不得不追寻有利投资机会,而这种情况下,股东价值也越来越低——所谓股东,本身就是向公司提供金钱的人,这些人力量相对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些观点会应验么?见仁见智,历史尚未终结,未来公司的形态仍旧在形成之中。当下我们确实目睹了有形资产到知识资产的迁移。随着硅谷独角兽们风生水起,我们不仅看到投资人赚得盆丰钵满,更看到了无数创业者的崛起。未来创业的兴起,看来正在形成新的公司形态,但也有可能是对于古典企业形态的回归。

无论古典企业还是现代公司,其实都是现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岩井的观点与科斯、德鲁克相似,指出公司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岩井是在重新回应弗里德曼与德鲁克的争议。弗里德曼对还是德鲁克对?德鲁克是站在企业内部来看,从管理者思路出发,一个企业很难脱离当地社区而存在,而如今的大公司更是要与不同国家政府打交道;弗里德曼则是站在企业外部来看,企业主与管理层口头说动机如何其实不那么重要,外人也很难考察,如何考验公司绩效?从这个角度考虑,坚持股东第一其实从长期和短期来看有合理性,公司股价表现短期可以不好,但是如果长期股价都不好,这个公司本质不会好到哪里。更进一步讲,股价表现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指标(或许是所有指标中最有效的指标),而且意味着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无法提供合格的股东回报的企业,很可能也没有创造足够的社会价值,这类企业不值得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换言之,在可以用于衡量的标准上,只能是股东、

员工权益和经理人权益等彼此协调,这些指标短期可能不一致,长期来看,成功公司必然谋求一致,否则也无法长期盈利。

公司作为大小股东、客户、管理层、员工、社会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存在,这一点并没有太多争议。问题在于,这不同利益共同体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公司决策应该如何发生?笔者认为,股东主权论或许武断,但是长期来看可能仍旧有效,而这种股东主权论,必然需要建立在承认公司公共体的前提之上,否则公司很难成为伟大的公司,也很难立足于当下复杂环境。

重塑公司,核心在于重新提倡负责任的公司观点,公司自然属于股东,但前提是股东承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与利益。

未来的公司

那么,未来的公司究竟怎么样?答案其实并不明确。身处后资本主义时代,岩井看到了知识的兴盛,断言古典时代公司的复兴。

未来的公司可能是什么样?岩井多年前的预言倒是与中国万众创业图景类似。他认为,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个人能够更容易开办企业的时代,企业有差异性就能够产生利润。他感叹,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的创业政策过于贫乏,日本经济在后产业资本时代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日本社会今后出现多少敢冒风险、有气魄独自开办公司的个人。

这种判断非常正确,毕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企业家,正如明治时代的经济变迁也离不开涩泽荣一这样的人投身商界。只是十多年过去了,僵化的雇佣体制虽然开始瓦解,但新的人才制度还是没有建立,社会需要更多活力。对于担心雇佣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来说,重新思考自身拥有的资产与出路,其实是新的方向。

事实上,创业并不仅仅是掌握高科技的天才少年的事,国际主流创业群体是中年人,这个年龄段积累了经验、人脉以及资源,创业有更高的成功概率。

对于日本社会,这或许也是好事。一方面,中年失业开始增多——随着日本终生雇佣制度的缓慢瓦解,重组以及解雇也在所难免,波及中老年职工。岩井指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

序列制都不是法律而是惯例。当然,不可否认,日本社会文化中非常强调习惯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一惯例的起源不是在日本,只是在日本维持的时间比较久而已。其维持也依赖于人们的预期,一旦人们不再相信,这种制度就会解体,先从中小企业开始,再到大公司。

这种情况下,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很多年轻人会选择短期打工或者说自由职业。随着昭和时代落幕,似乎很多人的野心消耗殆尽,“穷忙族”、“下流社会”、“草食族”、“乐活族”、“第四消费时代”等名词你来我往,即使当年高举改革大旗的竹中平藏也感叹,日本“太舒服而没法改变”。

问题在于,对于最精英的年轻人,譬如东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如何选择?如果还是继续公务员或者大公司这种单一选择,对于打破日本社会的沉闷并没有帮助。

《未来的公司》诞生以来,世界面目全非,日本衰退依旧,倒是衬托出这本书思考的可贵。一方面,金融危机中爆发了欧美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书中所谈问题,不仅是日本待解的问题,也是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国企改革等老大难问题。

我一直觉得日本是中国最好的镜子,但是国内对于日本经验的总结始终存在误区。以今日中国经济来看,其实和“日本第一”时代的日本有很多类似,泡沫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远去。目前国内对于日本的自满情绪并不可取,盲目乐观往往导致可怕的结果,除了认为“这次不一样”,还会认为“我们不一样”。

关于日本泡沫经济下滑,与日本文化关系问题,具体到日式公司治理,人们说了很多,但是日本危机的根源更可能在于资产回报率的持续下滑,这与错误的投资决策、盲目的管理、无法出清僵尸企业显然有关系,而这并不仅仅是日本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对中国而言,未来出清僵尸企业的时候,如何照顾员工感受以及纳税人权益甚至社会稳定等因素,显然需要借鉴日本经验。

时代在变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司形态也在变化,但一些基本原则不会,这也是《未来的公司》值得一读的价值吧。

(作者为 FT 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东京大学访问学者;本文写作参考《公司的概念》《企业的性质》《涩泽荣一传》等著作)

永不过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编译 / 薛晓倩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从未过时,即使在她去世后的 40 年里,再版书籍的销量依然超过了 20 亿。近年来,阿婆粉们饶有兴致的创作——比如苏菲·汉娜(Sophie Hannah)经授权续作的波洛探案系列之《字母袖扣谋杀案》和安东尼·霍罗维茨(Anthony Horowitz)致敬克里斯蒂的《喜鹊谋杀案》,以及据经典之作新编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都让这位“侦探小说女王”又火了一把。

衍生作品的畅销和改编电影的热映并不足以诠释克里斯蒂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深层原因。劳拉·汤普森(Laura Thompson)的《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A Mysterious Life)一书,更加透彻地分析了克里斯蒂令人着迷的原因:“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克里斯蒂习惯用我们熟悉的套路来颠覆我们的想象,这是她最擅长的把戏。但这又不仅仅只是个聪明的技巧,通过这种方式,她展示了洞察力以及对人性的通透的理解。”这部传记十年前已经在英国出版,最近才由出版商 Pegasus Books 引入美国。

据汤普森的描述,1890 年,阿加莎出生于英国托基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她与母亲的关系既亲密又激烈,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保护她,避免重蹈自己童年的痛苦。年轻的阿加莎非常富有想象力,但对人生的考虑也很明智。一战时期,她是一位技术娴熟的护士,与阿奇·克里斯蒂(Archie Christie)结婚后,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罗莎琳德(Rosalind)。

然而,她的想象力需要出口。她的姐姐也创作和出版小说,姐妹间健康的竞争氛围促使她写作并出版了《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正是在这部书中,克里斯蒂悬疑小说中的经典人物——比利时名侦探波洛第一次出现在读者视野中。克里斯蒂曾认真阅读侦探小说前辈的作品并从中汲取了养分,但她的作品很快便拥有了个人风格。

1926 年,克里斯蒂的生活与工作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折。当时《罗杰疑案》已经出版,这部波洛小说同样广受关注和好评。但那年 12 月,她的出走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在销声匿迹了 11 天后,她终于在哈罗盖特的一家水疗中心现身。克里斯蒂从未谈论过这次出走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棘手的感

情问题。后来,她又嫁给了考古学家麦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婚后的生活是快乐的,他们经常外出。再后来,阿加莎持续出版了大量的侦探小说,她的波洛神探、马普尔小姐还有其他一些角色,几乎每年都会和读者见面。然而,即使是最隐秘的伤痛也需要一个发泄出口。汤普森在传中巧妙地揭示了克里斯蒂如何在小说中用玛丽·韦斯特马科特(Mary Westmacott)这个笔名,诉说第一次婚姻失败所带来的痛苦、她与罗莎琳德的矛盾,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克里斯蒂是她那个时代的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译者按:隐身作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她才承认了这个笔名。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可以介绍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有控制力的、理性的女人,她知道人类所有的微妙情感,但是每次处理情感问题,都是一团乱麻”。相对的,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则是“敏感、隐秘的”。

汤普森并不认为阿加莎所有的作品都值得喝彩——克里斯蒂的小说中,至少有一种——《负担》,被认为是“结构散乱的”。她认为二战时期和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克里斯蒂创作的巅峰。这个动荡不安、两极分化的时代对克里斯蒂而言是有利的背景,她需要通过文字发泄内心的苦闷,并决定将她的文字呈现给读者。但这仍然不是完整的解释,否则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在阅读她的作品?当然,她对秩序世界的孜孜以求似乎也无法克服当代社会的弊病。

在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1969 年写给克里斯蒂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颇有见地:“阿加莎·克里斯蒂似乎并不预先知道故事的结局,因为所有的角色都很有趣。”尽管克里斯蒂依靠那些诡谲的阴谋获得了一些名声,真正让她受欢迎的却是她故事中塑造的那些经典人物,有着小小灰色脑细胞的波洛,极富洞见、近乎全知的马普尔小姐,以及动机、需求、欲望各异的故事中人和嫌疑对象。

克里斯蒂清楚地知道,当一个人想要谋杀,他便有能力施行——这是她能把手故事写得那么好的原因,也是我们喜欢阅读克里斯蒂小说的原因。

(本文选译自 Sarah Weinman 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书评)